

故事百则丛书



科举故事百则

王 志 东 / 编写 / 湖南出版社

GU SHI BAIZE CONG SHU

KEJUCUSHIBAIZE • KEJUCUSHIBAIZE • KEJUCUSHIBAIZE



前 言

科举,就是“开科取士”,即国家设立许多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以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

科举制开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直到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宣告结束,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将近1300年。

隋炀帝于大业二年创进士科,只用试策方法考时务策一门。当时革创未就,时间仓促。“秀异之贡,不过十数”(《隋书·儒林传序》),影响不大。

唐承隋制。高祖李渊即开科取士。太宗登基,便成定制。“制举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困学纪闻》)。如包括一些临时之数,“设科之名已无虑百数”(《登科记考》)。其时常贡科,包括秀才、俊士、明经、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等。明经考帖经,就是从经书中抽出一句,命考生将上下文默写出来。考墨义,就是对经文字句的简单作答。进士科考时务策。高宗时加考“杂文”,即箴、铭、表、赋之类的文体。玄宗时将诗赋作为必试项目。明经与进士两科最为时人青睐。明经约十人取一,进士约百人取一,诗赋也较帖经之类难考。故当时喻中进士为“登龙门”,有“二十老明经,百十少进士”、“焚香礼进士,嗔目待明经”等俗谚。另有特设科,包括道举(玄学)、童子(十岁以下能通一经)、一史(考《史记》)、三史

(考《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开元礼(通习开元时期的礼仪)、三礼(通习《礼记》)、《周礼》、《仪礼》)、三传(考《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各科考试内容,各有不同规定。

参加科举的考生有三种情况:一曰“生徒”,即各地学校及国子学、太学的学生。每经学校考试合格,可以直接到尚书省参加考试。二是不在校的读书人。这些人自己向所在郡、县报考,称“乡贡”。考中以后再到尚书省参加考试,叫“省试”。被送应试的人通称“举人”。三是有某种专长的知名人士,由皇帝特意下诏召集考试。这种考试一般是临时性的,不被人们所重视,贱称之为“杂色”。主持“省试”的考官,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担任,开元中改由礼部侍郎担任。礼部侍郎缺,则由他官代为“权知贡举”。礼部考试完毕,须送中书门下详复。

进士及第的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同榜之人谓之“同年”,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为“探花使”;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称为“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塔或雁塔题名,称为“题名会”;还有“曲江游饮”、“跨马游城”、“宿乐平康里”等活动。同年们还要一齐参拜当年主考官,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为“门生”等等。考中进士后,还须经过吏部考试,称为“选试”,经过审查,“选试”合格,才呈请皇帝授予官职。如果落选,只能到各处地方长官那里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

五代纷争,唐制相沿。

宋代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均进行改革。在形式上,首先是放宽录取和任用的范围。进士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赐“进士出身”;三等称赐“同进士出身”。每年录取二、三百人,最多时达五、六百人。一经录取,立即命官。其次

是实行“殿试”制度。“殿试”本为武则天首创，有唐一代未通行。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 973 年）举行殿试，从此正式确立州试、省试和殿试三梯级的考试制度，使考生均成为“天了门生”。再次，实行糊名考校之律。考生交卷后，录事人员即将其姓名等密封。考官审卷全凭内容为准。后来因考官辨认字迹而营私，甚至命人将考生试卷统统重新抄写一遍，然后交考官审批。较之以前，从考试的意义上说，考生录取与否便客观得多了。在内容上，主要是王安石变法，企图废止死记硬背，强调学以致用，为国家选拔有用之材。但终归失败，影响不大。

元代是少数民族政权，总的说来对科举不太重视。元太宗九年（公元 1237 年）决定分论、经义、词赋三科，诏各路考生应试，只要不离文义便可录取。被俘为奴的士子，也令就试。这一年共录取 4000 余人，以后一直中断 70 余年。皇庆二年又正式颁行科举制度，延佑二年（公元 1315 年）正式开考。考试分乡试（行省考试）、会试（礼部考试）和御试（殿试）三种。蒙古人、色目人为一组，考题较容易，录取较宽，考中以后列为“右榜”（蒙古以右为上）。汉人、南人（灭宋后所收服的汉人）为一组，考题较难，录取较严。考中以后列为“左榜”。这就是著名的“两榜制”。皇庆二年还规定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出题和答题标准，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代实行四级考试制，即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在院试以前有小考，考生参加县试和府试，及格称“童生”。童生参加省、府所在地方书院考试，即院试，及格称“生员”，生员与国子监的监生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三年一考，由皇帝钦命的主考官主持，每逢子、卯、午、酉年举行，称“大比之年”。因考期在秋季八月，故称“秋闱”。考试三场，取中者称“举人”，第一名称

“解元”。乡试中举称“乙榜”或“乙科”。乡试的第二年，即凡辰、戌、丑、未年，全国举人在京都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又称“礼闱”。考试三场，取中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贡士再到奉天殿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策试），然后分“三甲”出榜，均称“进士”。“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殿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俗称“三鼎甲”。“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殿试考中进士，称“甲榜”。明代科举最大的特点是实行“八股取士”。所谓“八股文”，就是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并限制用一定格式、体裁、语言、字数的应考文章，又称“经义”、“制艺”（义）、“时文”或“四书文”。

清代科举基本上沿用明代旧制。突出的变化有两点。一是雍正以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受特殊优待，只考翻译（满文译为汉文）一篇，称“翻译科”。后来虽实行满、汉同考，但满人仍有许多特殊优待。二是严惩科场舞弊。处分之酷，牵连之广，史所罕见。有的发展为文字狱。

另外，自唐代武则天首创“武举”科，允许学武艺的人通过科举求取功名，以后历代相沿，文武双科并举。但由于各种原因，武举影响不大。

中国科举的发展（不包括武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为“行卷”阶段。大约自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至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4年）。所谓“行卷”就是考生将自己平时所作的优秀诗文，主动献给当权者、知名人士甚至主考官，求得其青睐和干预，以利于或保证自己及第。行卷和科考成为当时考生及第的两大因素，行卷的作用力甚至更大。往

往行卷得力者，其考试未必真强；反之，即使考试真强，但由于行卷不力，也未必能及第。当然，考试的作用也不可抹煞。由于当时封建社会总的来说处于上升发展时期，科举制作为一种新事物，为广大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跻身统治集团开了方便之门。总之，这一时期的科举，可以说是发挥了激励成才、奖掖贤才、选拔真才的积极作用。

二是“求实”阶段。大约自北宋仁宗天圣元年至明毅宗崇禎十七年。宋仁宗天圣年间，实行“糊名”制，标志着“行卷”阶段的正式结束。所谓“求实”，是指追求考生“考试之实”，而不是笼统地指考生治国平天下的“真才实学”。“糊名制”、“誊录制”等等都是“求实”的手段。甚至“八股取士”也是为了“求实”，因为它有抑制审批者个人好恶、强调在考卷面前人人平等的作用。这一阶段，明承宋制，发展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元代的两榜制由于其他的原因而成为特例。这一时期的科举处于凝滞阶段，虽然积极作用也时有发挥，但总的说来消极因素在不断扩大，且越来越明显，正日益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御用工具。

三是“御用”阶段。大约从清世祖顺治元年至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科举发展到这一阶段，已完全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御用工具。两榜制是其公开表现，对科场舞弊实行严惩等则是其隐蔽形式。至此，科举已完全蜕变成一种消极的东西，并终于被历史所淘汰。

隋炀帝以前，曾经有过孝廉、秀才等等的荐举、征辟制度。虽然也是由州、郡推荐并经过考试，但考试并不重要，而是注重学识以外的门第、德行等等。科举制将读书、应试和作官三者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梯级整体。作为一种强调学识、面向社

会、公开而稳定的制度，为广大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甚至平民通过自身努力而跻身统治集团甚至上层统治集团，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从而保持和加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有利于巩固和强化统一的封建集权。从这种意义上说，科举制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但是，科举制的弊端却是显而易见，为害极烈的。

一、通过固定的考试内容、答题标准和写作格式，将广大知识分子引导到死记硬背、清谈故纸的死胡同，最大限度地抑制了人们的首创精神。明经科考帖经和墨义，完全是对于故纸的死记硬背，毫无创新可言。进士科的诗赋取士，似乎是最能发挥考生的自由创造和水平的了，但也有严格的统一的写作格式。如试帖诗多用十二句，六韵。首两句为题，中间八句两两相对，最末两句作结。按照这样严格的格式怎么能够自由创造，写出好诗呢？所以，清人王士禛在经过研究后总结说：试帖诗“类鲜佳者。如钱氏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全唐诗说》）。至于八股取士，更加严格地要求按照“起承转合”的“八股”格式“代圣人立言”，连写作内容也有格式规定。考试场中自是绝无佳作。即在平时，读书人也不得不以先人之文为揣摩典范。所谓“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明，白白昏迷一世”（《随园诗话》卷十二）。这样的治学方法和精神状态，当然毫无创造性可言了。

二、通过全国统一的钦命考试、钦命取录和钦命委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愚忠的知识分子，将封建的愚忠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人笔记有云：

刘器之晚居南京，马巨济涓作少尹。巨济廷试曰，器之作

详定官所取也。而巨济每见器之，未尝修门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语客。客以讽巨济，巨济曰：“不然。凡省闾解送，则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称门生。殿试盖天子自为座主，岂可复称门生于人。幸以此谢刘公。”客以告器之。器之叹服其说，自是甚欢。

马巨济当然是公开以“天子门生”自居了，刘器之“叹服其说”，不正是潜意识地以“天子门生”自命吗？这样一届接一届，一代接一代，未及第者以“天子门生”为求，已及第者以“天子门生”为荣。“率土之滨”，还有谁不是“王臣”呢？如此一来，则赐第一赐官和赐死同时并存；“江山依然旧，宫中血染红”，“几朝新皇帝，一个旧忠臣”等等，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中国封建社会自唐安史之乱后即开始走下坡路，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延续了一千多年。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科举制将广大民众通过知识分子和封建官吏而导入愚忠和愚昧，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科举作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从来没有重视过科学。历代虽有明法（法律）、明算（算术）诸科，从来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及第者名不见经传，既没有进士及第之殊荣，更没有进士及第之高官厚禄。各朝各代，上至皇帝，下至县吏，均以文学相高。对于发展科学，推动生产力进步，除拘守儒家之重农训条外，可以说既是门外汉，更无人热心。我国至唐代，生产力发展居世界前列，但后来却每况愈下。国力的衰微与科学发展的停滞是密切联系的。换言之，科举制至少是人为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抑制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罪魁之一。

本书作为国内仅有的一本专门介绍科举的趣味读物，以科举的纵向历史发展为线索，力求从方方面面展现人们或喜、

或悲、或嘲、或怒的科举百态。读者如能从中对于科举这种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有一个基本的、由浅入深的整体了解，那笔者就感到欣慰了。

编写者 王志东

1991年7月12日

于麓山枫树村

目 录

太宗皇帝真长策	1
状元来自《郁轮袍》	4
主考何如主官强	8
翻云覆雨	11
聊付素约	15
吃糕人	22
恰逢其时	27
因祸得福	31
试策宣政殿	34
七旬状元	37
君到来时近夜来	42
而今始得碧纱笼	46
李颐与顾少连	50
故人子	53
居之不易	56
笔补造化天无功	60
倒挂榜	64
人镜芙蓉	67
至交同登进士	71
莫向春风怨未开	74

吴武陵荐贤	77
及第困一生	81
膺门之贵，岂宜有此生	85
从此不知兰麝贵	89
公道善价	93
果然街得锦标归	96
双妻记	101
错认颜标作鲁公	106
多谢和尚	108
九天机遇	112
天下为家	115
圣主永为座主	119
表里难如一	122
乞索儿登第	126
正邪之间	129
卷帘谁不看神仙	133
赵琮及第	136
嫁女记	139
童子赐第	143
崔颢一第	145
适得其反	148
全家送上渡头船	151
从兹稳上青霄去	154
咆哮公堂	156
以衣易粟	159
科甲可易	163

欧阳修慧眼识三苏·····	167
宋朝大试为何改在九月·····	171
酒后真言·····	174
枉费心机·····	177
秦桧弄权·····	181
五十年前二十三·····	184
成人之美·····	187
隔墙有耳·····	190
定一亭·····	195
布衣状元·····	198
永乐御批进士名次·····	203
独木桥·····	207
考官官·····	210
康熙评卷·····	213
院试文,快短明·····	217
艾家鑑案件·····	221
龙汝言中状元·····	229
机关算尽太聪明·····	233
唐金门舍身救主·····	236
曾文衍千古遗恨·····	239
换卷记·····	242
陈玉铭欲得反失·····	245
抠名记·····	248
飞鸽疑云·····	251
曾国藩洒墨得高科·····	254
天国女魁·····	257

指“焉”为“马”.....	260
三字经.....	264
梁启超科场饮恨.....	268

太宗皇帝真长策

隋炀帝大业年间，李世民随父李渊起兵。经过几年的拼搏，在灭隋之后又荡平群雄，终于建立起大唐王朝。李渊成了唐高祖。

在诸子中，李世民排行第二，因此，位居第一的建成被立为太子。李世民在大将秦叔宝、尉迟恭等人的支持下，猝然发动了一场“玄武门政变”，诛杀太子建成及其亲信元吉等，终于使李渊让位，自己做了皇帝，称号太宗。

长期的征战，尤其是玄武门之变，使李世民深深懂得人才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秦叔宝、尉迟恭等人的支持，自己怎能做皇帝？因此，登基以后的唐太宗，始终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作为巩固统治的头等大事来抓。

他首先虚怀纳谏，把臣下向自己提意见当作一面明是非、纠过失的“镜子”，鼓励和奖赏臣下谏诤。由于他虚怀若谷，很多本来站在敌对立场的人才纷纷为其所用，象秦叔宝、尉迟恭、魏征过去都是他的敌人，后来才成为他的心腹和得力助手的。

他随时留意人才的出现。有一次，粗通文墨的武将常何对朝廷政治提出了几十条十分中肯的意见。唐太宗很惊奇，询问他：“这些建议都是你想到的吗？”

“不是”，常何老实地回答：“是臣的家仆马周提出来

的。”

唐太宗明白了，这位马周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他立即任命马周当了一个大官。后来，马周一直做到宰相。常何也由于荐贤有功而得到了一大笔赏赐。

有一次唐太宗亲自嘱咐大臣封德彝荐贤。封德彝久无所举，还为自己辩解说：“不是不留心，也不是不荐，实在是当今没有贤才呀！”唐太宗听了十分生气，批评他说：“君子用人如器。你怎么能够诬蔑普天之下没有贤才呢？”

大臣李大亮、刘洎推荐了一个名叫李义府的人。唐太宗决定先试一下这个李义府到底有没有才，命令他即席咏鸟。李义府随口吟道：

日里颺新彩，
琴中闻夜啼。
上林如许树，
不借一枝栖。

唐太宗听了，颇有感慨，连忙说：“与卿全树，何止一枝！”

李义府毕竟有人推荐，但是，大量的人才由于没人推荐而“遗之在草泽”。给予每一个人以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这是一个摆在唐太宗面前的头等重要、异常复杂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于是，在唐承隋制的大局氛围中，由隋炀帝草创于大业年间的科举制就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发现人才、罗致人才的制度而规定下来，并付诸实践。虽然此事在高祖时就开始，但唐太宗却使之更完备、更具体，成为一种必须的经常性的具有完整体系的制度。天下人才终于找到了一线施展才能的光明，纷纷地努力实践着“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希望。

有一次，唐太宗站在楼上，看见新进士们整队而入，十分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有识之士对此举的政治功用大为赞赏。当时有民谣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从此，科举制便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演出了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活剧。

状元来自《郁轮袍》

王维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诗人，是唐诗山水田园派的重要作家。

王维从小就学习写诗，据说五岁时就有诗名。他会画画，还精通音乐，善弹琵琶。由于具有多方面才能，他很自信。他不仅像当时一般年轻人那样希望通过进士考试而获得功名，而且下定决心要一举考取状元。

于是，他怀揣诗卷，游说于达官贵人之间，得到了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范的特别赏识。有一次，岐王问王维：“你的诗写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参加进士考试呢？”

王维看了看岐王，坦率地说：“不是不想参加，而是有所求。”

“像你这样的水平，考取进士是没有问题的”。岐王肯定地说，亲切的眼光向着王维：“我一定替你推荐。”

听到岐王的赞许，王维当然很高兴。“只是，我之所求不仅如此！”

“哦！”岐王显然有点吃惊，“那么，你还求什么呢？”

“我要考取今年的状元！”王维斩钉截铁地说。然后语气一转，诚挚地向岐王请求：“您既然这样赏识我，就请您帮帮忙吧！”

这下岐王更吃惊了。他把王维上下打量了一遍。这是一